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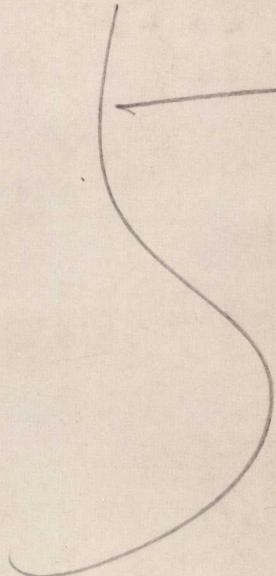


上海论坛丛书
Shanghai Forum Series

> 2007

丛书主编 王生洪 秦绍德 金在烈

CG24.3
3



主编 彭希哲

亚洲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策略与实践： 人口、性别与城市研究

Strategies and Practice for So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s of Population, Gender and Urban Studies in Asia

■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论坛丛书
Shanghai Forum Series

> 2007

丛书主编 王生洪 秦绍德 金在烈

主编 彭希哲

亚洲社会可持续 发展的策略与实践： 人口、性别与城市研究

Strategies and Practice for So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s of Population, Gender and Urban Studies in Asia

■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洲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策略与实践:人口、性别与城市研究/彭希哲主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上海论坛丛书/王生洪,秦绍德,金在烈主编)

ISBN 978 - 7 - 208 - 07803 - 1

I. 亚… II. 彭… III. ①人口-可持续发展-研究-亚洲②男女平等-研究-亚洲③社会发展:可持续发展-研究-亚洲 IV. C924.3 D443 D7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0253 号

责任编辑 邱盈华

封面装帧 人马艺术设计工作室·储 平

· 上海论坛丛书 ·

亚洲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策略与实践

——人口、性别与城市研究

彭希哲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9.5 插页 3 字数 263,000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7803 - 1/F · 1739

定价 34.00 元

“上海论坛丛书”编委会名单

主 编

王生洪 复旦大学校长
秦绍德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
金在烈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

副主编 许 征 复旦大学副校长

编委会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石源华 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任
许 征 复旦大学副校长
吴景平 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李志青 复旦大学上海论坛办公室主任
沈丁立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金 泽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国际学术部部长
信 强 复旦大学上海论坛办公室副主任
袁志刚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郭有德 复旦大学上海论坛办公室副主任
康泰硕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国际学术部科长
彭希哲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
樊勇明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

本书编委会名单

主编 彭希哲

副主编 郭有德

编委会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桂新 王菊芬 任 远

郭有德 梁 鸿 彭希哲

秘书 徐 建

上海论坛共识： 亚洲的和谐发展将造福全世界

亚洲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对世界具有重要的影响。亚洲各国文化多元,制度各异,人口众多,优势互补,经济繁荣。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下,亚洲各国正在经历深刻的制度变革、结构重组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新的发展与合作空间日益增大,快速成长的亚洲城市已开始扮演全球网络节点的重要角色,增强了亚洲和全球的活力。

由于地缘和文化的原因,亚洲各国在历史上保持了长期的互动和协作发展,共同为亚洲和世界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中叶以来,亚洲较为成功地整合了政府与民众的目标,使发展的速度不断加快,表现出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特征。亚洲的崛起由日本率先开始,随后是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及部分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创造了“东亚奇迹”。始于1978年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使这个具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经历连续28年的高速增长。与此同时,印度经济也在快速崛起。

亚洲经济社会发展也面临着诸多严峻的挑战: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承接了全球的制造业转移,形成了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导致能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恶化;金融领域的不断开放,带来金融风险及其传导效应增加等等。

过量消耗资源和污染环境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亚洲国家和地区已经或正在步入资源节约型的发展模式。能源问题关系各国的经济安全和可持续发展,能源安全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难题,所以,能

源合作应该成为亚洲区域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济的一体化需要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既促进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又给世界各国带来了更多的金融风险。亚洲各国、各地区和各金融中心,应以亚洲的共同繁荣和稳定为目标,加强金融合作,增强应对金融风险和促进经济社会稳定的能力。各国政府必须建立一套安全有效的地区汇率协调机制,维持汇率的动态稳定,消除各经济体之间汇率恶性竞争的基础。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的汇率制度与货币政策对其周边国家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是中国主动适应国际汇率形成机制的重要举措;人民币汇率的合理调整,体现了中国的大国责任。中国将积极参与和推动东亚金融货币领域的合作,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促进亚洲共同市场的建设。

拥有多元文化的亚洲各国、各民族,共同传承着古老而灿烂的文明。亚洲各国、各民族应该增进跨国家、跨地区、跨民族的文化沟通与交融,经济往来与合作。亚洲曲折的历史还告诉人们,只有和平共处、平等合作、互济互助,才能和谐发展、共同繁荣。

亚洲的和谐发展将造福全世界!

Contents 目 景

- 1 上海论坛共识：
亚洲的和谐发展将造福全世界
- 1 中国人口城市化三次历史性的重大转折
田雪原
- 14 中国人口即将发生的重大转折
原 新
- 23 中国、日本、韩国低生育水平及未来人口发展趋势
尹 豪
- 37 上海人口规模增长与城市发展质量
王桂新
- 66 国际都市的人口内涵：上海与主要国际都市人口发展的比较研究
任 远
- 93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人口空间变动与城市空间结构重构
宁越敏 李 健
- 107 论中国“农民非农化”与“农地非农化”的协调
简新华 张国胜

- 123 |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研究
刘传江 董延芳
- 136 | 男女的平等参与与分享
——中国经济性别平等的现状与评估
蒋永萍
- 154 | 优化妇女就业环境：
妇女经济参与的政策法规体系及社会支持
王菊芬 葛影敏 陆荣根
- 170 | 全球化与中国女性劳动
金一虹
- 188 | 非正规就业女工团结权的实现
——以全国第一个家政工会为例
郭慧敏
- 200 | 中国医疗卫生改革进展
郭有德
- 214 | 多部门合作的城市医疗救助模式
姚 岚
- 224 |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Welfare States in China
— A Case from Southern Jiangsu Province
Xizhe Peng
- 243 |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ertilit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Dudley L. Poston, Jr., Heather Terrell Kincannon, Jungwon
Yoon

- 278 | Australia's Support for the Poor in Accessing Health
Services
Christopher Scarf

中国人口城市化三次历史性的重大转折

田雪原

城市化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强有力的“引擎”，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怎样评价当前中国城市化的速度和结构，选择什么样的城市化模式和道路，还存在不同观点的争论。提出和研究中国人口城市化三次历史性的重大转折，分析三次转折“拐点”出现的来龙去脉，实为探索城市化发展诸多问题的枢纽。

一、第一次转折：由“慢车道”驶入“快车道”

城市化是一个综合的概念。从人口学角度观察，城市化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一种过程，是人口的城乡结构问题；从劳动学角度观察，是就业在一、二、三次产业之间的分布和结构问题；从经济学角度观察，是农业、加工业、服务业为主的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问题；从社会学角度观察，是工业社会取代农业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现代文明取代传统文明的社会进步问题。但是城市化的核心是人口的城市化。因为变农村人口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就是人口和就业结构转变、产业结构升级、现代文明取代传统文明的社会进步过程。因此，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分析，一部人类文明史特别是现代文明发展的历史，就是人口城市化不断推进的历史。据联合国人口司提供的数据，1950年世界城镇人口所占比例为29.8%，1980年上

升到 39.6%，2005 年上升到 49.0%，城乡人口差不多平分秋色。同期我国人口城市化与之比较，有相同也有不同之处，参见图 1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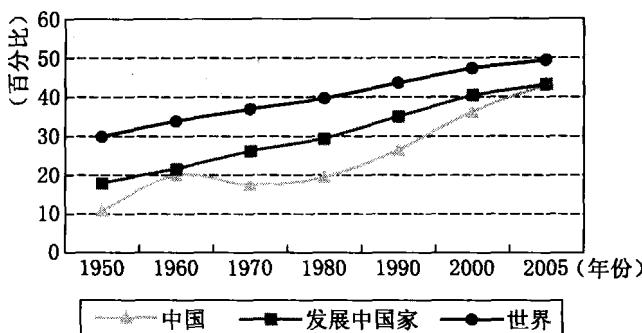


图 1 1950—2005 年中国与世界、发展中国家人口城市化比较

图 1 显示，中国 1950 年至 2005 年人口城市化变动与世界、发展中国家比较，相同的一点是都有较大幅度的提升；最大的不同在于世界和发展中国家呈斜线平滑上升，中国则是在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之后，才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2006 年略有超过。就城市化速度而言，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三个时期：1950 年至 1960 年的 10 年快速发展时期，城镇人口比例由 11.2% 上升到 19.7%，年平均升高 0.85 个百分点。1961 年以后先是 12 年后退，1972 年退至 17.1% 最低水平；后是 8 年补偿性回升，1980 年回升至 19.4%，接近 1960 年水平。总体上，可称之为人口城市化 20 年徘徊时期。1981 年以后城市化速度加快，2005 年城镇人口比例上升至 43.0%，年平均升高 0.94 个百分点，为城市化加速推进时期。按照人口城市化 S 曲线理论，城镇人口比例 25% 至 65% 为 S 曲线中部加速挺起时期，1987 年城镇人口比例上升至 25.3%，标志着中国人口城市化驶入“快车道”；则 1987 年至 2005 年城镇人口比例年平均升高 0.98 个百分点，比 1980 年至 1987 年年平均升高 0.84 个百分点高出 0.14 个百分点，为半个多世纪以来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²。中国人口城市化由慢转快的历史“拐点”出现在 1987 年，由此城市化驶入发展的“快车道”。

转入“快车道”后的中国人口城市化能走多远？就外部主要依经

济发展情况而论,改革开放近 30 年来取得 GDP 年平均增长 9.7% 的骄人业绩,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在“快车道”上同步行驶,甚至比城市启动还要提前一些。国外特别是亚洲的日本、泰国、新加坡等国发展的历史表明,驶入“快车道”后的经济发展,保持 40 年以上的高经济增长率是有可能的。将近 30 年的中国经济的高增长要比这些国家强得多,条件比它们好得多,形成的惯性要大得多,因而未来中国将经济强势格局保持相当长一段时间是比较有把握的,国内外对此取得较多共识。经济是基础,经济在“快车道”上运行,必然推动人口城市化也在“快车道”上运行;城市化是“引擎”,人口城市化行驶在“快车道”上,反过来又会拉动经济也高速增长。

就城市化自身而言,按照人口城市化 S 曲线走势三阶段理论模型,当城市人口所占比例在 25% 以下,即处在 S 曲线底部起步时期,一般发展速度较慢;25% 至 65% 处在 S 曲线中部挺起上升时期,发展驶入“快车道”;65% 以上为处在 S 曲线顶部徘徊期,即使城市人口比例仍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也改变不了类似股市 K 线图的“头肩顶”形态。这一理论和由这一理论建立起来的模型,已被世界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国家的实践所证实,有着普遍的意义。2006 年我国人口城市化率达到 44% 左右,刚好处在 S 曲线中间部位,高速推进方兴未艾。近 20 年来城镇人口比例年平均升高近 1 个百分点的高增长率有望延续,在 2025 年至 2030 年达到 65% 左右,赶上并略超过届时世界平均水平。事实上,近 20 年来人口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并没有完全消化掉过去长期积攒起来的势能,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推—拉”力量仍较强劲。按照赛尔奎因 (M. Syrquin) —钱纳里 (H. B. Chenery) 理论模型,在 2005 年我国三次产业结构达到 12.6:47.5:39.9 的情况下,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应为 40:25:35,人口城乡结构应在 60:40 上下。实际上,我国人口城乡结构要落后于三次产业就业结构许多,就业结构又落后于按产值计算的三次产业结构许多³。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三次产业结构、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人口城乡结构变动,如图 2、图 3、图 4 所示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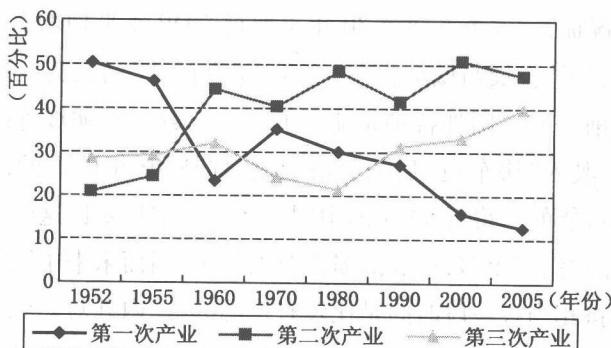


图2 中国三次产业结构变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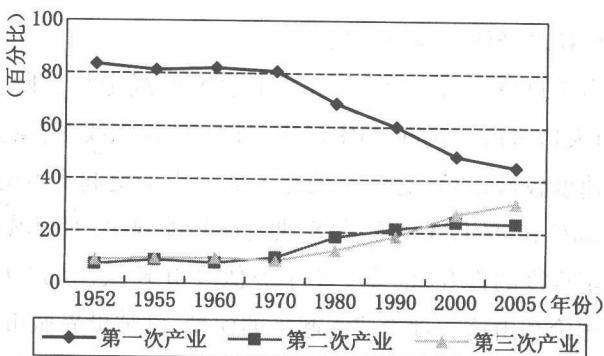


图3 中国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变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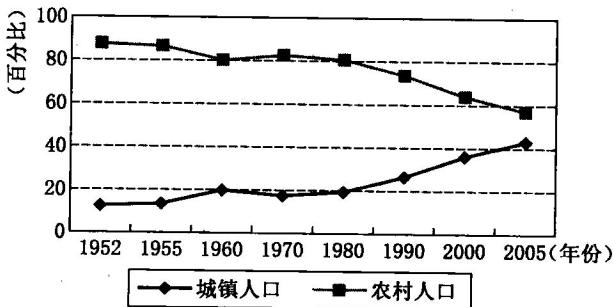


图4 中国人口城乡结构变动

二、第二次转折：由“以小为主”转变到“以大为主”

考察世界人口城市化发展的历史，可粗略地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

段,农村人口主要向中小城镇转移和集中,亦称之为乡村城市化;第二阶段,乡村和中小城镇人口主要向大城市、超大城市集中,进而形成以大城市圈为主导的人口城市化;第三阶段,大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中心区人口向郊区和其他乡村迁移,称之为逆城市化。发达国家人口城市化走过的道路证明,这三个发展阶段大体上同城市化 S 曲线走势的底部、中部、顶部三个时期相对应。长期以来,我国人口城市化采取的是“重小轻大”方针,走的是积极发展小城镇、适当发展中等城市、严格限制大城市规模的道路。强调农民工进城“离土不离乡”,对“小城镇,大问题”的诠释是:发展小城镇解决了城乡发展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大问题”。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乡村城市化成为人口城市化的主旋律,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过大作用,作出过重要贡献。但是随着人口转变,相应的生育率、出生率的下降和新增人口就业压力的相对减轻;经济转轨,包括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经济增长方式由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的转变;社会转型,即由政府主导型向公共服务型的转变等的良好开端和初见成效,使“重小轻大”的城市化变得越来越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终于在世纪之交走到历史转折的“拐点”,过渡到以大城市、超大城市为主导的人口城市化第二阶段。比较1990年与2002年大、中、小城市结构的变动,这种转折清晰可见。(参见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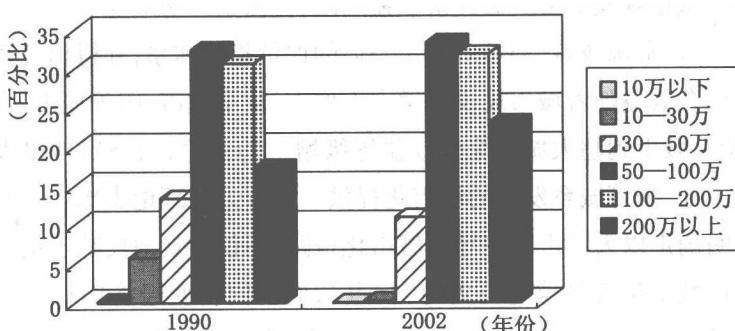


图5 1990年与2002年城市人口规模结构变动比较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第255—262页;《中国统计年鉴1991》,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3页。

图5显示,2002年与1990年比较,50万以下人口城市比例均有

较大幅度下降,尤以 10 万至 30 万降低 5.5 个百分点为最大,30 万至 50 万下降 2.42 个百分点次之;50 万以上人口城市均有较大幅度增长,以 200 万以上增加 5.74 个百分点为最大,100 万至 200 万增加 1.2 个百分点次之,50 万至 100 万增加不足 1 个百分点。如以 A 代表 50 万以下人口中小城市,B 代表 50 万至 100 万大城市,C 代表 100 万至 200 万特大城市,D 代表 200 万以上超大城市,并设 1990 年 A:B:C:D=1:1:1:1,则 2002 年 A:B:C:D=0.59:1.03:1.04:1.30。如果粗略地将城市规模以 100 万人口为界分成较小城市与较大城市两部分,两者相比则由 1990 年的“六四开”,变动到 2002 年的“四六开”。而且近几年来这种趋势还在增强,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人口所占比例在不断上升,特别是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都市圈特大城市的加速发展,东南沿海其他城市组带、内地以省会为中心的城市群和双向增长极型城市的迅速崛起,使以都市圈为主导的城市化特点逐渐显露出来。

其实关于城市规模与效益的关系早有比较成熟的理论,即城市规模与经济效益大致上成正相关变动的结论。但是由于不同规模城市在成本上表现出的差异,在城市规模与成本—效益的决策上,各国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会作出不同的抉择。最近有学者采用因子分析方法研究城市规模效益突破经济效益局限,提出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人口效益、资源效益、环境效益于一体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得出总体上城市综合效益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大而增大,从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到超大城市综合效益逐级增大的结论,为坚定地以大城市为主导、统筹城乡发展的城市化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适时提出并明确走以大城市为主导的城市化道路,不仅客观地反映了世纪之交人口城市化道路越过历史的“拐点”,而且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一脉相承。城市化以大城市为主导,改造并提升中小城镇的质量,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迄今为止,我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1989 年至 2005 年 GDP 年平均增长 9.7%,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平均增长 20.6%,明显地显示出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特征。目前我国 GDP 总量占世界 6% 左右,而消耗的石油却占到

世界的 8%、矿产资源占 10%、电力占 13%、煤炭占 30% 左右；单位 GDP 能源和材料消耗大约为美国的 2.7 倍，日本的 3.4 倍，高耗低效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老大难”问题⁵。这种外延式扩大再生产同人口城市化道路和方针密切相关。前面提到，20 世纪 80 年代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由于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具有投资少、见效快的“短平快”效应，既拉动了 GDP 的增长，又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就业，促使人口城镇化的步伐加快起来，小城镇的发展解决了不少“大问题”；然而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之后，到 20 世纪末这种以高耗、低效乡镇企业作支撑的小城镇的发展，由于资源浪费、效率不高、破坏环境到了再也无法继续下去的地步，这时对“小城镇，大问题”的诠释，变成了小城镇的发展真的成了“大问题”。我们扬弃片面追求 GDP 增长的传统发展观，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实现由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的转变，人口城市化道路的转变是重要基础之一，作用不可替代。

三、第三次转折：由注重城市自身发展转向城乡协调发展

我国人口城市化速度驶入“快车道”，模式挺进到以大城市为主导，但这并不意味着城市化速度越快越好、城市规模越大越好，而是要寻求适当、较快的发展速度和大、中、小城市规模合理的结构，遵循城乡人口、经济、社会以及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原则。考察世界人口城市化发展的历史，步入以大城市为主导的城市化或都市圈式城市化，大致有四种类型：一为欧洲文化型，以巴黎、巴塞罗那为代表。这些大城市的发展以欧洲文艺复兴为文化底蕴，以 18 世纪中叶产业革命的兴起为经济和科技背景，形成既有欧洲民主、平等文化色彩，又有先进科技、产业支撑的都市圈；二为经济集约型，以纽约、东京为代表。即在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中形成的以制造业、金融和商业等为支柱产业的超大城市组群，具有很强的中心、主导、辐射功能；三为美国中西部散落型，以洛杉矶、盐湖城为代表。是在美国西部开发中，随着东